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四期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1a)

【史海钩沉】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余汝信
【文革探索】	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上)	卜伟华
【旧案新探】	田家英命案探幽 (下)	陈小雅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 余汝信 •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见本刊zk0910d——编者），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47页）。这个在批判林彪时曾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革命的简报”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许多人并不清楚。

一、吴德对简报签发过程的回忆

关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当事人（签发人）之一的吴德生前曾回忆道：“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1）。

对于陈伯达的发言，吴德回忆明显有不准确处。陈的发言并没有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手舞足蹈”一段话，是汪东兴发言谈及国家主席问题时陈的插话，并不是陈自己发言中的话。

吴德接着又说：“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2）。对于汪的发言，吴的回忆倒是基本准确。

关于简报的签发过程，吴德称：“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3）。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4）。

这样，我们知道了，简报的签发人是李雪峰、吴德（可能还有解学恭），李、吴、解都不是以后官方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成员（李曾经是，文革后就不是了）。

二、林彪讲话与陈、汪发言的拥护者

第六号简报列举出参加讨论、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的发言者有：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及陈毅。

这些人当时的职务——刘锡昌：原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郑维山：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郭玉峰：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聂元梓：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原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马福全：原石家庄3302厂工人，时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钱学森：原七机部副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邝任农：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吴涛：时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原陆军第四十军军长，时任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尤太忠：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彭绍辉：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陈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均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这些人当中，调子最高者，如钱学森。简报称，“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陈毅的调子据说不低，可惜他当时被视为‘右’的代表，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他的外交部长一职，1970年6月已被姬鹏飞所“代理”），简报势利地没有引述他尖锐的发言，可见当时发言能上简报是件光彩的事，同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上的。同样地，发言者中除陈伯达外，没有以后官方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成员（郑维山、刘子厚曾经‘上贼船’，以后解脱了）。

文革后，发言高调者，如陈毅，仍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钱学森，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即便“上了贼船”的郑维山，亦重任大军区司

令员。官方说，他们只是曾经受了蒙蔽而已。

三、“华北组最激烈”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官修《毛泽东传》声称：“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5）。所谓最激烈，不外是最为群情汹涌，慷慨激昂。体现在简报中即为以下段落：“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这些话语，足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惊恐不安，也使毛泽东立即下大决心使全会的形势发生逆转。

《毛泽东传》还称：“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揪人’”（6）。

诚然，陈，吴、叶、李、邱的发言，矛头一致指向了张春桥，惟却都没有“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内容。“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指责他们“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不过就是向张春桥发动了攻击。《罪证》引述的陈伯达的发言称：“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叶群称：“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鹏称：“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称：“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7）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没有其他的理论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论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为籍口。这是今天很多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理解的。惟五年以后的那一场欢欣鼓舞的胜利表明，打倒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是历史前进的正途，是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并不是什么罪行。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错，错只在选择这么一个发难的时机大大失策而已。

众所周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首先倒霉的是参与华北组活动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

在华北组反张及鼓动设国家主席最积极的汪东兴，检讨过关；而受汪误导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联合汪一起向张春桥发起攻击的叶、吴、李、邱（还有林彪及没有上山的黄永胜），毛一直没有放过他们，庐山的事没有个完，直至走到了“九一三”。

（2009年9月）

注释：

〔1〕〔2〕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116—117。

〔3〕简报中并没有陈、汪发言的内容而是称陈、汪的“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4〕同〔1〕书，117—118。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574。

〔7〕陈、叶、吴、李、邱的发言节录，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页9—13。

□ 原载《记忆》第三十四期，2009年10月14日

~~~~~

## 【文革探索】

### 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上）（1）

• 卜伟华 •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得到三味书屋刘云生老师的邀请，到这里来和大家谈一谈有关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我对文革史的关注有二十多年了，写过一些有关文革史的文章，今天把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谈一谈，和大家进行交流，希望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谈的不对的地方，请在座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我今天准备讲四个问题：一、当前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二、我对文革研究的几个主要观点；三、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四、关于文革回忆录。

#### 一、当前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

王年一先生几年前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才过去了近30年，许多大学生已不知道‘牛棚’为何物（以为是养牛的棚子），许多解放军战士已不知道林彪是何人。不是他们得了健忘症，环境使然。我们一些人常常耻笑某国忘记了二战历史而推崇德国，殊不知我们自己也忘却了文革的血泪史，或者对历史上的丑恶不敢正视。我们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了太多太多，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恩格斯说过这是最好的学习）。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要努力铲除可以滋生文革的条件。”我认为他说的是很对的，是针对国内现状发出的警世之言。

唐朝大诗人杜牧在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也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历史的悲剧也可能会重新上演。

当前国内研究文革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档案问题，还有一个是出版问题。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有机会对中央档案馆的文革资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查阅。1987年，中央准备组织编写一本比较正式的文革历史，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我作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代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两位研究人员进驻中央档案馆，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档案资料查阅与抄录工作。抄录和复印了大量的重要档案资料，仅文革时期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就复印了上万页。后来“六四”事发，中央关于编写文革史的计划搁浅，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还在北京市委档案室和北京市档案馆蹲守过几个月的时间，查阅了那里存放的大量的文革档案。北京市委档案室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是比较开放的，查阅档案没有多少限制。后来市委档案室的文革档案都转到了北京市档案馆，查阅起来比以前严格多了。我注意到，他们印制的档案目录上，贴有许多白条，即原来规定可以查阅的档案中，后来又有很多件档案不让查阅了。

文革档案可以说是进行文革研究的必要的基础条件，但在中国，却形成了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接触档案的独特现象。现在国内文革研究者进行文革研究主要依靠两个，一个是国防大学王年一等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编》，一个是旅美学者宋永毅等编纂，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其中收录了各种文革档案资料计三千多万字，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

根据1987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规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档案都应该开放了。但咱们国家的档案法后面还有一个说法：“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绝大多数文革档案都被封闭的现状。

《档案法》还规定：未开放的档案也可以利用，但怎么利用，要“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于是这一条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话。

最近看到有消息说，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档案馆开放了部分文革档案，但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去年11月，有媒体说北京将开放文革档案，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但不久就宣布说此事“暂缓”执行，这一“暂缓”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虽然从来没有明令禁止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但国内文革研究的环境确实是很严峻的。1986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说：“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借口“可能引起的反效应”，对出版文革类图书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最近几年此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加剧，现在国内基本上封杀了所有文革书刊的出版发行。

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写的一本《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写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但作为研究文革史的人看来，这本书写的不好，人们最希望了解的东西写的很少，还有不少文过饰非的东西。

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最近出版了讲述他在文革中的经历的一本书《我的“文革”岁月》，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很特殊的。我还没看这本书，但据看过这本书的人说，其中还是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前两年还有一本黑龙江原著名造反派头头范正美写的一本书，书名是《秋梦追思》。范正美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的第一把手，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的班长就是范正美，后经中央做工作，才将临时权力机构的第一把手的位置让给了潘复生。此书上标明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据我所知，此类书刊的出版都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的，但这本书是没有经过审查的，我判断，它十有八九是一本非法出版物。

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原江青的秘书阎长贵与原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写的一本书《问史求信集》，基本上是近几年来他们在《党史博览》等刊物上发表过的有关文革的文章。

偌大个中国，这么多年来也就出版了很有限的这么几本有关文革的书籍。

国内出版不了怎么办？就都跑到香港去出了。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不少有关文革的书籍。以下为近年来香港出版的部分文革书籍：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鲁礼安：《仰天长啸——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王力：《现场历史》。

王力：《王力反思录》。

陈晓农编：《陈伯达晚年遗稿》。

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7·20”事件的群众记忆》。

徐景贤：《十年一梦》。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卢弘：《军报内部消息》。

米鹤都：《聚集红卫兵》。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红卫兵日记》。

孙维藩：《孙维藩文革日记》。

孙维藩：《清华文革写真集》。

范达人（原梁效写作组负责人）：《梁效往事》。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周良宵、顾菊英编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约250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约300万字，共收录文革期间“中央首长”讲话1100余篇。第三部分是《十年文革大事记》，50余万字。前两部分是光盘，第三部分是纸质书籍。《十年文革大事记》前，有作者撰写的长篇序言，表达了作者

对文革的痛切反思。)

周泉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郑光路：《文革文斗》。

郑光路：《文革武斗》。

石言（郑维山秘书）：《历史真相》。

周伦佐：《论文革造反派》。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舒云：《林彪画传》。

丁凯文：《重审林彪罪案》。

丁凯文：《百年林彪》。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十年》。

郑义：《红色纪念碑》。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宋永毅：《文革大屠杀》。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陈冀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还有一些自费出版物，如武汉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湖南李振祥的《四十七军湖南支左纪实》。天津的王林、王端阳父子文革期间的日记。这些自费出版物印数很少，一般人很难找到。

还有一些党史部门、史志部门最近几年内部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专著或资料集，如齐齐哈尔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齐齐哈尔市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海南文化大革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风雨十年——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区县大事纪略》。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云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1966.5—1976.10）》。这些内部出版物印数不多，收集比较困难。

再有就是大量的网上文革回忆录、资料集等。

互联网是一个信息的海洋，有关文革的资料也是浩如烟海，关键是看你会不会找，当然还有一个分析、整理、鉴别的过程。

国内官方的文革研究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万马齐喑、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无所作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文革这一段的历史，写了一二十年了，还没有结果。条条框框非常多，文革历史越写越简单，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的现象严重存在，敏感的问题不敢碰，涉及形象问题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文革的反思和总结基本上停留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水平上。

一些人还以《决议》已经对文革作了结论为由，阻碍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其实，《决议》只

是从政治上对文革历史作了原则性的结论，它可以成为目前进行政策宣传等方面的指导思想，而决不应该成为研究文革历史的障碍。毫无疑问，《决议》不能取代历史研究，相反，《决议》本身就是对文革历史研究的一种成果，而且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发展，《决议》中的一些结论和表述也可能会有新的说法。有人拿邓小平曾说过《决议》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来说事，认为进行文革历史研究也应该“宜粗不宜细”，这当然是错误的。一方面，《决议》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受体裁和字数的限制，当然不能太细；另一方面，也受当时对文革历史研究的不够深入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细致地对文革历史进行总结。一些人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污点，搞文革研究就是要给党抹黑。此说虽然极为幼稚可笑，但确实存在于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其实，有污点并不可怕，犯过严重错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历史，甚至掩盖或歪曲历史。

另一方面，民间的文革研究要比官方的文革研究生动得多，也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方兴未艾，渐入佳境，良莠俱现，五彩斑斓。一些有质量的文革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比较突出的有：国防大学的王年一教授，他已于前年去世了。王年一长年致力于文革史的研究，晚年疾病缠身，还坚持不懈。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另外像重庆的何蜀、湖南的陈益南、湖北的徐海亮、北京的印红标、徐友渔、唐少杰、关于军队文革很有研究的余汝信等等，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当然，民间的文革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无序的，既有反思、批判文革的文章，也有颂扬、维护文革的文章，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总的说来，是比较有生气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

## 二、我对文革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观点

关于文革史的研究，我想阐述以下几个观点：

1、对文化大革命的界定。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可以称为广义的文化大革命，而狭义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特指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

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三年。2003年11月，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问从美国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先生：“据您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多长时间？”麦先生不无幽默地回答：“我们原来认为是3年，不过为了与你们国内的口径一致，而且也为了我们的书能在中国更好地销售，我们把它改成了10年。”〔3〕

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7年基本上延续了前3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3年和后7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爆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3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7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3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7年则基本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前3年和后7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运动，是一场内乱。只有在前三年，它才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而后七年，虽然还在喊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但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和形式。例如在中学，九大以后一直到1978年，所有的中学里都还有红卫兵组织存在，但这时候的红卫兵，已和前三年的红卫兵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将广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和狭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结果就淡化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实际上不利于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

2、当前国内文革研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为尊者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化大革命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多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他们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他确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划圈我划圈”，但他在有些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

3、对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反映的不够。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把许多“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

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在一段时间里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纷纷起来参加夺权，在夺权后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时，又因观点分歧和利益冲突而产生分裂，继而大打出手、武斗不止。在全国各地的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公、检、法被砸烂，法制荡然无存。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非法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然将无辜群众判处死刑，草菅人命。文革中多次出现将“五类分子”斩尽杀绝的恶性案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6年在北京大兴（死325人），1967年在湖南道县（死4519人），1968年在广西自治区（死数万人）发生的案件。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化大革命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

在这一时期，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斗当权派、斗学术权威、斗“黑五类”、斗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抄家、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一个云南赵健民特务假案，审查了138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一个“内人党”的错案就有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起来，应该记录下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

4、国内过去关于文革的研究多重于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许多论者长于宏观评论，但对于文革中的许多具体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却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和史料散失，这种研究和分析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如果没有对当时的事件、人物、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例如讲文革中出现了夺枪事件，但如果不把在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印象的。你光讲出现了许多起夺枪事件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文革中全国夺枪的规模到底有多大？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中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4）”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止，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5）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这样的历史就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了。

5、应当正视文革历史，反对在文革历史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的表现是无视“文革”历史的存在，对惨痛历史教训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压制人们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封锁人们了解“文革”历史的渠道，包括在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的设置种种障碍，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解密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档案迟迟不能开放，提供利用。历史决议否定了“文革”，但不能一否了之，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任务还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全民族认真对待。

注释：

（1）这是2009年8月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提纲。

（2）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年12月10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其中规定：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等工具书，今后相当时期内，各出版社均不得安排。已安排了的（包括在印刷过程中的），凡未经过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专门批准的，一律撤销，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二、凡属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及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一般不要安排，确有价值的选题，地方出版社要专题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宣传部，中央级出版社专题报上级主管部（委），经严格审查同意后，写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新闻出版署并中宣部审批。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前一段时间已出版了不少，原则上不要再安排。那种捕风捉影、肆意虚构、夸大史实，以林彪、“四人帮”的所谓“野史”、“秘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得再出版。确有一定价值、严肃认真的回忆录，地方出版社专题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宣传部，中央级出版社专题报上级主管部（委），经审查同意后，写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新闻出版署并中宣部审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出版。这些回忆录必须事实准确，不得违背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不得使用中央未正式公开的历史材料，不得随意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个人品德问题。四、上述准予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图书，目前限由各地人民出版社及有关的中央级社会科学出版社安排出版，其他出版社均不得安排。这些书一律不得以协作出书和代印代发的方式出版。五、上述图书的发行全部交新华书店，不得交由个体、集体书摊（店）批发。六、翻译国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图书，一律按上述规定执行。七、凡未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的目前正在安排、印制有关“文化大革命”图书的出版社，接到本通知后，一律暂停印发这类图书，同时将选题和图书安排情况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听候处理。八、本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包括没收利润、罚款、追究领导责任等处罚。处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决定，必要时由新闻出版署决定。九、过去规定凡有与本规定不符者，按本规定执行。

〔3〕麦克法夸尔先生和瑞典的一位中国文革研究者沈迈克最近出版的新书《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使用的是“文革十年”的说法。

〔4〕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72—1976），第834—835页。

〔5〕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

（未完待续）

~~~~~

【旧案新探】

田家英命案探幽（下）

• 陈小雅 •

◇ 师徒反目——陈田矛盾的症结

田家英原是陈伯达的秘书，是陈伯达将他推荐给毛泽东的。

据叶永烈《陈伯达传》记载，先是1946年2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发觉，毛岸英在苏联多年，已经基本俄化，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知识颇为欠缺。于是，毛泽东想请陈伯达当毛岸英的教师。可是，陈伯达正忙于自己的著述，便以自己的福建话毛岸英“听不懂”为理由推脱了。不过，他还是向毛泽东推荐了自己的秘书田家英。（45）

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老师，和毛泽东的接触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但还不是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他当上毛的秘书，是1948年的事情。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主席到西柏坡以后，我仍常去他那里商量工作，当时我住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村。中央决定办新的党校、即马列学院以后，因刘少奇同志还有其它许多工作，所以具体的办校工作是由我承担的。我首先请杨献珍同志担任教务长，又请艾思奇主讲哲学，王学文主讲经济学，何其芳主讲文学。学校搬进北京以后，我又聘请郭大力讲授《资本论》，请吕叔湘讲授语言文字。

“开始办党校，琐碎事很多，我让田家英当秘书，帮助做些须要跑腿张罗的工作。毛主席到西柏坡后，每天要看的文件报刊增多，他自己看不过来，让我荐一个人帮看，从中选出重要的再交他看。我开始让史敬棠去。一次我去主席那里，他正忙，江青说史敬棠做事太拘谨，不合适，主席让我另荐个人。我说：田家英教岸英中文时，已和主席认识了，就让田家英来吧，和史敬棠对换一下。我回去把此事告诉田家英，他听说要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像是身价突然高了，也不谈谈该注意的事，不久，毛主席要他上东北学习，他才又谦虚些，托我这样那样。直

到后来要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我因为一个人顾不过来，需要有个人帮搞校对等事，我跟主席说，还是让他回来，才又把他从东北调回来。（46）

如果这个陈述是准确的，那么就是说，陈伯达曾三次向毛推荐田家英。不仅如此，在更早的时间里，他还曾把胡乔木也推荐给了毛泽东。在叶永烈著《胡乔木》一书中，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证实了此事：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47）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月，也就是二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48）

从这个过程看，陈伯达并不是像一些人渲染的那样，有着“忌贤妒能”的品质。在早期便熟识陈田双方的人那里，一般都认为，陈比田大十八岁，无论学历还是革命资历，在田的面前都是长辈，本来是不可能构成一对矛盾的。长辈讲晚辈的坏话、师傅拆自己推荐的学生的台，都是自毁名誉的事情，陈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而且极爱面子的人，他不可能在这些小事上失了分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老师对学生不可以从严要求。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使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逐渐恶化了呢？为探求这个本源，笔者不得不遍查田的亲友回忆，以寻找这个矛盾的症结点。并发现，这个矛盾，很可能是由这件事开始的：

据逢先知回忆，在陈伯达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49）他写过几本书。作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研究员的田家英，曾帮助陈收集过不少资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收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据说，从此田家英对陈伯达感到了寒心。

陈对于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等级观念的痕迹。按照旧社会的习惯，徒弟应该为师傅做一切事情，从白天打工，到夜晚打洗脚水；前台应酬顾客，后台帮着主人带孩子；既是雇工，也是佣人。学徒帮师傅做一切事情都是应该的，而功劳归功于师傅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服务期”是有限的，三年徒满，师傅就有义务帮徒弟自立门户，于是，成为师傅的徒弟又对自己的徒弟以同礼待之……“三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媳妇熬出头以后，那就是另一种身价了。在中共党内，虽说是已经“革命”了，但这种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并没有改变。文革中，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带头造“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反的首长的警卫、秘书，青年干部或青年教师，大多数出身贫苦，有许多本是被当作“培养对象”来加以“磨练”的。如果没有文革，这种压抑时间长了，自然也会发酵。

依田家英的性格，他是一个不能“吃暗亏”的人。受到委屈的他需要渲泄，而他的朋友，大多是同情他的。他多次与多人讲，“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偏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他认为陈伯达“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对自己所作的工作成绩，以及在毛那里得到表扬都“不能容忍”。并认为自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所以成了陈的“一块心病”。〔50〕

1955年，根据毛的提议，中共中央重新成立政治研究室，陈伯达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逢先知说，“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

田对陈的“不买帐”的情况，也为李锐所证实：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51〕

关于此事，胡乔木也有同样看法：

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痛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52〕

陈伯达在中共党的“八大”决议中鼓吹“唯生产力论”是否错误？在今天，这已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实事的“揭露”，与其说证明了陈伯达不常在鸡零狗碎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不如说，他考虑的是属于“治国路线”这个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倔犟”——在高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面前，重弹“转向经济建设”的老调。以至于毛泽东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与他合作过！这从反面证明，人们所说的陈善于察言观色、揣摩毛泽东意图，牺牲原则曲意逢迎毛的嗜好，至少是不全面的。

至于胡乔木列举的“郑州会议”事件，则是完全不真实的。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事情的经

过是：

1958年10月，毛主席写信给我，要我与张春桥一起到河南省（山查）崂山卫星人民公社去看一看。……我们刚到时也弄不清其中奥妙。过了几天，有一个老头子悄悄告诉说，那块麦地是有人在夜里把其他田的麦子搬来堆成的……

“我们离开公社先到遂平县城，当晚一些县干部和我们聊天，有一个会计说：“我们这里出沙子，现在我们用沙子到武汉去换机器，大家说这是产品交换。”他的说法，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到郑州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见毛主席。在正式汇报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遂平县那个会计把沙子交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什么“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我没有说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更没有写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我只是闲说了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可是不知怎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却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感到大家都怕和我接近。为了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就找出一个人做靶子，这种做法不好。我个人渺小得很，怎么可能有能力造成那种普遍性的错误倾向呢？

我当时确实很生气。没有根据，就给扣上了帽子，我还不得不做检查，真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

实际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实行产品交换的，是马克思本人。……毛主席是马克思的学生，他在大跃进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也有机械照搬马克思的地方。他察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无法责备马克思，就找了我做靶子，想扭转一下错误的风向。我后来也想通了，既然是不好批马克思，拿我来当替罪羊，为了大局，我也不必计较。（53）

针对胡乔木的说法，陈伯达说，当时，胡乔木并不在场，所以，他只是出于相信毛泽东而误信了此事。故此，陈认为，胡对这种荒唐的说法也不必负责任。

问题是，是谁将毛的这个意图“一传十，十传百”的呢？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大概属于一个。只是他与毛泽东不同，他并不一定想栽赃给陈伯达，但他显然是乐意看到陈伯达倒霉的。

第二件最伤害陈田关系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改让田家英替他起草“八大”讲话稿。据叶永烈记叙，事情的经过是：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在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毛泽东著作出自他的笔下。不过，在筹备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事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开幕词。

“陈老夫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毛泽东一看，摇头了。

可是，这时离开幕之日已经很近。

“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干了一个通宵，写出来了。（54）

目前还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个举动，是否和陈伯达在“八大”决议稿中提出与毛泽东路线相悖的“唯生产力论”是什么关系，但可以想见，用一篇“学生”的稿子否定了“老师”的稿子，对于陈伯达这样一个骨子里颇为自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这正是毛泽东的风格。毛的这个行为，具有双重的意义：他不仅打击了陈伯达的傲气，而且倡扬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素愿——学生不仅要超过老师，而且，可以“革”老师的“命”！

不知道毛泽东在宣扬自己的“八大”开幕词捉刀人时，心中是否怀有替这位“小人物”出气的意图？但此事对于陈伯达和田家英的“身教”意义，实在太大了！不言而喻，陈田一对师徒，从此关系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毛泽东不仅对这些事情熟视无睹，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二人调开，使这对革命的同志不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内耗”上，而是用在搞好工作，以便更快乐地生活之上……不，深通事物“矛盾”性质的毛知道，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矛盾。与其去了解、适应新的矛盾，不如驾轻就熟地维持旧矛盾的平衡。

同时，毛泽东对于自己这两位秘书的“人性的弱点”也有着深刻的洞察，但他似乎也没有想任何办法——譬如，通过他十分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他们警醒与改正，以达到互相尊重，精诚合作……不，如果他们改正了缺点，成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有缺点的毛就难办了。在一个能以万事万物为己所用的人眼里，人性的弱点恰好为他的御控提供了一种“资源”。一个人的好坏，可能取决于他的优缺点的多少，但一个人的成败，却不系于身边人物优缺点的多少，而在于能适当地利用和驾驭这些优缺点。

作为一个疑心极重的帝王，毛希望的就是“左右”的不和。那样，他的左右可以自动自觉无须督促的实行“互相监督”与“互相牵制”之功能。如此，他才能够安心地睡觉！所以，他除了在王明和周恩来之间搞平衡，在刘少奇和高岗之间搞平衡，在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搞平衡之外，他也在自己的近臣叶子龙和汪东兴之间、陈伯达和田家英之间搞平衡……。他信任田家英，但田终其一生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而“老夫子”却得享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他不让任何一方得势，也不让任何一方彻底失败。除非他决定抛弃一件旧的工具，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田家英和陈伯达可能至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实际上一直有声有色地活跃在毛

泽东为其设计的“格局”之中。在这个格局中，一方将另一方仇恨到死，而且将仇恨延续到下一代……

当然，由于一个更大格局的变数，毛泽东最终没有把这个平衡继续玩下去。这一终止意味着，在本来平衡的两方中，有一方必须出局。只不过，毛决定保留的那一方暂时还不知道，在自己的利用价值完成之后，毛还是要卸磨杀驴的。而下面我们还要讲到，毛杀陈时，使用的正是田家英留下的“刀子”！

◇ 决定田家英生死最后砝码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探讨一下前文提出的问题了：决定田家英生死最后砝码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田家英是何时下决心结束自己生命的？

可以肯定，这种致田于死命的，是一种叫做“信息”的东西。不过，它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一种足以导致他对前途、生命，对人绝望的信息。这种信息，也不是单独从某一个时间的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人那里获得的，而是行为人根据他个人的“兴趣”焦点，从众多的信息中过滤、筛选出来的要点及其综合判断的结果。

在田死之前的至少48小时内，他出于自愿、主动，甚至不惜冒“违犯纪律”的指控去做的，就是在搜集这种信息……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信息呢？

早在中央专案组设立之前，公安部已经为他的某一“特殊问题”立案。这一事件，并没有使田的生命信念发生过动摇，所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这件事是可以排除在外的。而在田去世前的两天中，他也获得了很多信息。譬如：

- 1、5月21日，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停职反省，交清文件，不得外出；
- 2、5月21日晚，汪东兴向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对田的决定，并历数其错误，其中有许多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
- 3、5月21日半夜至5月22日凌晨，从与梅行的会见中获得的信息；
- 4、5月22日，汪东兴向他宣布搬出中南海；
- 5、5月22日晚，从与戚本禹接触中获得的信息；
- 6、5月23日上午，妻子董边对一夜未眠的他既无安慰，也无担忧，照常上班……

或者，他还从其他的渠道——譬如他的邻居兼秘书逢先知或其家人处获得的信息，只是由于未见诸文字，外界尚且不知道罢了。

以往的研究者、作家，或田的亲友一般认为，导致田自杀的信息有两条：其一，是被人污控“篡改毛主席语录”；其二，是被勒令搬出中南海。

凡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都知道，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篡改毛主席语录”无疑是一条足以致人以死命的“大罪”。但田家英自杀之时，文革才刚刚开始，恐怖形势尚未形成，更何况，据胡绳回忆，所谓“删除”之事，并不存在，田只是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如果此事属实，是完全可以关从关的稿底稿上看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说得清的问题。在5月21日深夜田家英对梅行的谈话中我们也可看出，他是坚信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的。此外，即便是田动手删除了那段话，以田家英和毛泽东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会有恃无恐，许多别人不敢说的

话、不敢做的事情，他就敢说敢做。而且往往先斩后奏，有惊无险不乏其例。这里仅举一例。据逢先知回忆：

当年，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室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的文稿，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把信的全文抄录一份以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毛要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人。秘书室立即写检讨报告，并申诉抄录存底的理由。毛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做了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指示，今后凡是他写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就这样，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后来，毛泽东发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这件事应当感谢田家英……（55）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抄写改为拍照，自然是害怕日后有人伙同秘书们在抄件上做手脚。不过，此事让笔者想起，如果逢先知所说的这个“规则”在田死后依然实行的话，那么，在1972年“批林整风”运动时——也就是毛泽东最需要证实自己的“先见之明”时，他为何不拿出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照片，而只能提供秘书徐业夫的抄件呢？这是否证明，这一次，需要作假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了？

言归正传，田家英的敢作敢为、无法无天也由此可见一斑。

再则，田家英一贯对陈伯达、江青抱以鄙视态度，他明知是被“小人”污控，却反倒被“小人”乱了方寸，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也引用一段田的友人杨波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田的自信：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得知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就趁机写材料攻击国家计委，说计委工作不得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决定新成立一室，由陈伯达分管，把我从中央办公厅调到国家计委工作。这一期间，陈伯达多次在我面前谈到他对田家英不满，攻击田家英同志不买他的帐。……1966年春节过后，陈伯达到了成都，要我跟他一起在四川看“大三线”建设的情况。这是我与陈伯达一起工作的最后一次。工作结束时，陈伯达找我谈话，又攻击起家英同志，诬蔑家英同志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改造”。这次谈话，我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去看望家英同志，告诉他陈伯达要动手整他了，请他注意提防。当时，家英同志正在编《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听了我说的情况，他并没有在意，并且以鄙视的态度告诉我他多年来与陈伯达打交道的情况，以及他对这个伪君子的本质的认识。（56）

那么，被勒令搬出中南海是否足以让田感到绝望呢？有人形容，这个命令使田家英感到奇耻大辱，“心如刀绞”，所以，他选择了“以死抗争”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事实根据。如李锐所述，早在50年代，田就对他说过，如果将来“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人公提三条意见”，这说明，田对于离开中南海，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只是，他可能没有料到，会被“逐出中南海”。

还有不少人认为，汪东兴5月21日晚的传达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田在公私问题上牵扯矛盾太多，与其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既维护了个人的尊严，也保护了其他同志……这，当然也是我们考虑，董边那一天为何照常上班，同住一个院子的逢先知对田没有丝毫“监督”，汪东兴既已对田采取了有效的“保卫”措施，却没有能防止田的死亡，等等这些谜团的一个视角。

不过，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猜测。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死亡与失望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一个

人的失望，只能从他曾经的希望中寻找。真正能使田家英的生命根基发生动摇信息，必须从田在最后时刻努力探取的事情中寻找。譬如：

在5月21日三人谈话中，田家英曾向安子文提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安子文的回答是：“统统交。”

又譬如：田家英问安子文，自己应当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事后，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5月22日晚，他甚至主动给戚本禹打电话，想从自己的这个“徒儿”那里探得更确切消息：“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

读者一定发现，这一系列的探问，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毛泽东是否知道对他的处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究竟怎样？

显然，当安子文要他交出文件时，他对这些“文件”是否包括他正在编辑的“毛选”还曾发生怀疑；当他听说三人“代表中央”与他谈话时，他对此事是否瞒着毛泽东也心存希冀。而当他被无情地告知，连“毛选”编辑工作也要交时，他知道，这至少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当他得知检查必须从1959年庐山会议起时，他便知道庐山上自己最致命的问题，无非是给毛的三条“建言”的被揭露。难道是毛泽东要和他算总帐了吗？田家英自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他愿意相信的是，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论怎么看，也只能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他目前的处境，不过是受“小人陷害”罢了。但如果是小人陷害，为何会由周恩来和刘系大将安子文出面主持？如果仅仅是小人陷害，为何一向倚仗毛的后盾，敢于与江青作对的汪东兴也大打出手了？……

田是一个思维缜密，见解锐利的人。通过这一切迹象，他不会没想到，这件事情的总后台，其实就是他——就是那个自己寄予过全部希望、并奉献了青春、才智的，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父亲”的人！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在读中学时，兄长就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他从那时起，就不得不靠稿费维持学习与生活。这种“后天缺爱”的经历，使得他必定要在生活中追求弥补。从与比他大三岁的董边结合，得以弥补母爱的缺失；从甘当毛泽东的内外贤助，他也得偿父爱的亏欠。据田家英在延安时代的同事杨述回忆，田在杨家岭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时，就常常可以见到毛。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们是随同毛一同撤离的。当时的田家英“曾写一首诗表示对于敬爱的领袖，愿尽全力爱戴保护的意思。”他曾把这首诗抄给了杨。（57）

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只有26岁。据逢先知说，有一次，毛请他吃饭，本来很有酒量的田家英，这次只喝了一点点酒就醉了。（58）逢认为，由此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他把此事当成一种多么盛大的隆遇！

李锐在回忆中也谈到类似情况：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

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59）

逢先知则证明，“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

在50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毛的亲友文运昌、毛泽连、王淑兰（毛泽民夫人）、杨开智等人来见他，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后毛再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毛给亲友的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都由田家英办理。毛的表兄王季范病了，田受派前去探望。九十几岁高龄的齐白石老人有心里话要亲自对毛诉说，田家英奉命登门聆听。徐悲鸿去世了，毛特派田到北京大学向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表示慰问。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有时田家英也作陪。……（60）

柳亚子在1949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该宴极欢”。在5天以后的另一篇日记里，柳亚子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61）

1951年的某日，田家英患了感冒，毛泽东还亲往探视。因此，说毛把田当作自己的一个儿子看待、使用，是毫不为过的。毛曾有意让他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管家，李敏没有兴趣，毛于是选择了田。

田不仅政治思想和性格成长受毛的影响极大，而且与毛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如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当然，还有喜欢女人……用报告文学家叶永烈的话来说，田与毛的相处，堪称“如切如磋，亲密无间”！

这种“无间”的接触，无疑培养出了田家英对于毛泽东一种超乎“革命同志”的感情，超乎“学生对导师”的感情，“党员对领袖”的感情。这，是一种“专私”的爱情！

这种专私，不要说容不下陈伯达这类“老朽”的窥探，就连毛的夫人也是排斥的。

这，就是田家英的“病”！

他爱他，所以为他的缺点而担忧，他爱他，所以才急不择言也认为对方能够谅解；他为自己与他的思想分歧担忧，为他们关系的疏远担忧。他从不怀疑毛对他的信任，出了问题，统统归结与小人的离间……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求证的只有这一点：“他还爱他吗？还信任他吗？”

下面，让我们来重温戚本禹所说，田在最后时刻“铤而走险”的那个情节：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

这就是他需要最后确认的：谁？

尽管戚本禹说，他不敢违犯纪律，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笔者认为，他肯定把这个意思传达到了：

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要他停职检查的。（62）

田家英应该能想到这一点，而且当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只是要确认一下罢了。

◇ 田家英留下的“刀子”

据逢先知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对人说，田家英也没什么问题。逢先知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追悔？是对田家英的想念？是对田家英的重新评价？（63）

我想，此时的毛，想到的大概不是别的，而是需要有人来替他承担文革的责任了。从抛出所谓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到批判“四个伟大”、“顶峰论”，虽然矛头指向林彪集团，但这些理论说辞，却是陈伯达提供的。当毛泽东决定敲山震虎，拿陈伯达开刀时，他自然会想到陈的对立面。而从田家英的朋友陆石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田在死前曾为毛留下了一件多么重要的“制陈”的武器。陆石说：

（1965年9月的一天，陆石到永福堂看望田家英）

那天，家英同志告诉我，在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上，他和罗瑞卿同志就与林彪存在着根本原则的分歧。……

有一天晚上，罗瑞卿总长突然打电话给家英，说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对此持怀疑态度。

“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总长很同意家英同志的观点，遂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一来，可闯下滔天大祸了。林彪知道以后，恼恨在心，咬牙切齿地指控他们“反毛泽东思想”——那个罪名可定得不轻啊！

家英同志起身拿暖瓶斟茶，手臂微颤，开水洒在杯子外面。他苦笑了一下，慢慢放下水瓶，取抹布拭净茶几，又慢慢坐下：

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究竟是谁反毛泽东思想呢？”他呷了一口茶，尽量放缓音调，“说心里话，我给罗瑞卿同

志讲的，留了很大的余地。实质上，所谓‘顶峰’的提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别有用意，不仅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且连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反掉了。你想想看，‘顶峰’者，绝顶也，尽头也。这个意思很清楚，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尽头，不能再发展了，当然就没有生命力了。怎么办呢？那就必须用一种别的主义或别的思想来代替罗。什么主义呢？鬼知道，反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顶峰论’的实质。难道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你不要看‘顶峰’那两个字，听起来抬得很高，实际上是贬得很低的。哼，那个人真还懂得一点‘辩证法’哩，哈哈……”〔64〕

2007年6月5日于北京

注释：

〔1〕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82页。

〔2〕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第124页。

〔3〕董边《忆家英》，同上，第273页。原载1981年《人物》第五期。

〔4〕《王力反思录》，第594—595页。

〔5〕载《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6〕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77页。

〔7〕载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8〕同上书，第136页。

〔9〕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初版九刷，第450页。

〔10〕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原载《动向》2002年三月号。

〔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1998年第8次印刷，第34页。

〔12〕关于董边是否见到田家英的尸体？目前有两种说法。戚本禹说：“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俊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王力也证明：“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谈田家英死的经过。”但叶永烈说：

“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

‘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在她清早离家时，丈夫还是好好的，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道。

安子文也长叹了一口气，他也显得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

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显然，因为家中发生了意外事情，解放军来看守现场的。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由此判断，董边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是下午在诸位主事人的要求下才看了田

的遗体。

〔13〕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24页。

〔1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34—35页。

〔15〕李锐《怀念田家英》，载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45页。

〔16〕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书，第123页；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88页。

〔17〕1965年11月10日。

〔18〕12月8日《红旗》第十三期。

〔19〕参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75—276页。

〔20〕胡绳《忆家英二三事》，载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33页。

〔21〕见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83页。

〔22〕《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陈小雅采访），载《多维》月刊2006年，第5期。

〔23〕同上书，第143页。

〔24〕《杨尚昆回忆录》，第296页。

〔25〕戚本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26〕《王力反思录》，第595页。

〔27〕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53页。

〔28〕见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4页。

〔29〕见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毛对汪东兴说：“他（田）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30〕公安部内部通报指控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参见陈小雅《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载《动向》月刊，2005年5月号。

〔31〕曾自《爱书爱字不爱名》，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86页。

〔32〕同上书，第231—232页。

〔33〕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工作。

〔34〕史莽《苟利国家生死以 敢因祸福避趋之》，同上书，第197—199页。

〔35〕同上，第263页。

〔36〕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41页。

〔37〕陈烈《“小莽苍苍斋”收藏轶事》，载《北京日报》2003年2月。

〔38〕西泠印社2005年版。

〔39〕胡绳《忆家英二三事》，同前书，第134页。

〔40〕方行《书海文苑一知音》，同前书，第233页。

〔41〕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82页。

〔42〕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58页。

〔43〕见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第十二章“《红都女皇》——案中案”，香港共和出版公司2006年3月第二版。

〔44〕据网络资料刊载《河北日报》《书刊报》：《一封令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

〔45〕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 1993年11月版，第175页。

〔46〕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9页。

〔47〕胡乔木与谷羽的女儿。

〔48〕叶永烈著《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年2月第一版，第39—40页。

〔49〕毛泽东任该室主任。

- (50)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81页。
(51) 李锐《怀念田家英》，同前书，第143页。
(52) 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前书，第123页。
(53)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64页。
(54) 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44页。
(55)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11页。
(56) 杨波《益师良友》，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54页。
(57) 杨述《一点往事的回忆》，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36页。
(58)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1—2页。
(59) 李锐《怀念田家英》，同前书，第144页。
(60)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11—12页。
(61) 见《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63、365页。
(62) 见戚本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63)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84页。
(64) 陆石《我心匪石》，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28—229页。

□ 原载《多维月刊》2007年8、9、10月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